

美国梦

幼河 艾楠 著

形形色色

形形色色



中国青年出版社

美国梦形形色色

幼河 艾楠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吴书杰
封面设计:许 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梦形形色色/幼河,艾楠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1
ISBN 7-5006-2359-3

I . 美… II . ①幼… ②艾… III . 社会生活 - 社会分析 - 美国 IV . D7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742 号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海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6.25 印张 115 千字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7.00 元

目 次

移 民

难民中心	(1)
奥列格和柳芭	(4)
大、小阿马德	(9)
越南“船民”	(13)
阮大夫和他的儿女	(18)
老挝山民	(20)
饥不择食的“徐娘”	(24)
哑巴的悲剧	(27)
同样的结局	(29)
下嫁乎？手段乎？	(30)
男人们的手段	(33)
“老墨”	(35)
“老中”	(39)

美利坚土地上的中国人

开餐馆的与“打工仔”	(42)
“君子固穷耶”	(45)
“后盾”们	(46)
“那我不成老头了！”	(49)

婚变	(54)
无需自尊的实用主义	(59)
求职种种	(63)
职业市场的边际效应	(69)
德高望重的中国郑教授	(71)
IBM 老资格的部门中国经理	(74)
通用汽车公司里的中国设计师	(76)
住在富人区的中国主妇	(79)
天各一方的中国美术师夫妇	(81)
实验室里的中国女主管	(83)
“我要对得起良心!”	(85)
“我的心受伤了!”	(87)
“我放不下我那摊事!”	(89)
有了绿卡, 来去自由	(91)
“为了家庭只好不走了!”	(92)
“在国内我们更自在, 更有用, 朋友 也更多”	(94)
持 J-1(访问学者签证)的人们	(95)
豁免回国服务: 事虽荒唐, 但是合法	(100)
申请绿卡的各个环节	(102)
此一时, 彼一时: 持 F-1(学生签证) 的人们	(108)
傲慢与偏见	(110)

美国人的梦

拉里,我的驾校师傅	(115)
弗兰克·战士	(122)
越战老兵——柯里	(127)
“小野先生”	(130)
迈特	(134)
工头珍尼特	(139)
阿库娃	(143)
萨姆森博士	(148)
南希一家人	(155)
安妮	(166)
鲍勃	(172)
艾德格和卡罗琳	(180)
焦尼,你在哪儿?	(183)

移 民

如果把美利坚比作一艘豪华客轮，不少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因向往这艘客轮甲板上灿烂的阳光、舒适的躺椅，自由自在的氛围而漂洋过海。当他们终于把脚踏上船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置身在这艘豪华客轮的底舱……

难 民 中 心

刚到美国，我到 K 市闹市区的一个难民中心学英语。这个难民中心是一个天主教堂开办的非盈利性慈善机构。美国大、中城市都有类似组织。工作人员多为虔诚的教徒和志愿人员。这里免费教英语，经常赈济食品，因此难民云集。每当世界的某一角落动乱，那里的难民就会在这里出现。他们常常是通过教会直接从动荡地区输送到美国来的。

1975 年以后的一段时期，这个难民中心里充斥的难民大多是来自印支三国，越南人为最多。我到难民中心上英语课的时候，总能看见矮小的越南人领救济食品，白色或黑色面孔表情呆滞，大约是美国人在越战时留下的后代。他们居住的社区属于贫穷、高犯罪率贫民区；一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常驾

驶着破旧的汽车在街区里乱闯，驾车的姿态与放纵的美国年轻人无异，胳膊从敞开的车窗伸出来，扒着车顶，收音机里播发的滚石乐震天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英语一塌糊涂。

90年代初，大批前苏联犹太人移居美国。难民中心常挤满了这些男女老幼。上英语课时，他们毫无顾忌地大声用俄文交谈，似乎目空一切。美国当地富有的犹太人捐了大笔的钱给这所天主教堂，因而难民中心给予新到的犹太人许多优惠；衣食住行安排得很好，还帮助寻找工作。这些使其它国家的难民嫉妒不已。

饥荒和战乱送来了肤色黝黑的索马里人和其他非洲人；伊朗巴列维国王的倒台使一些伊朗人流落于此；阿富汗的战争使不少阿富汗的部落臣民作梦也没想到会到美国来；一次我竟看到两位阿尔巴尼亚的小伙子，当时正值阿国内政治动乱。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人也曾走马灯似的在难民中心出现，他们流动性很大，多为非法入境者。中国国内来的人也不少，还有从台湾省来的。他们到这的主要目的是学英语。

外国人在美国生存很大的障碍是语言不通，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要使没有英语基础的难民掌握一定的英语去应付生活谈何容易，此外，他们受教育水平极差，又无技术专长，他们怎样在美国实现他们的梦想呢？

人们总是不愿承认违背自己意愿的现实。难民们来之时，往往期望值过高。一段时间后，又常常会经历心理上的巨大挫折。每当我与一些神情沮丧的难民比划地聊天时，他们最常抱怨的就是美国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为什么找不

到工作？”在他们心目中认为自己很聪明，美国人很笨，是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有时这种精神压力会把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人压垮。

一天我从一群哭泣的索马里人那儿得知，他们其中一人妻子自杀了，撇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可我还记得他们刚来时是多么的欢喜若狂。

1990年前后美国政府接受美国士兵遗留在越南的子女来美国的人数达到高潮。他们是美国士兵在越南作战期间和越南妇女所生的后代，越战结束后，被遗弃在越南。当他们在难民中心出现时，我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父亲，可常常是一问三不知。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肤色相貌和他人的旁证被获准来美国的。

一个刚到美国才2个月，肤色白白的姑娘异常兴奋地告诉我，人人都说她长得像法国人，非常漂亮。她要嫁一个白人，找份永久性的工作，当然一定要读大学。可据我知道她并无数、理、化基础，英语水平也极低。

我始终记着教室外边走廊里的那张大宣传画，标题为“难民的道路”，表现的是荒漠之中一条无尽头的路。美国人希望难民们正视他们在美国社会生活下去会遇到的严酷的现实，同时乐观的美国人又示意，在艰难中毕竟还有路，只要肯走就可前进。

这幅画，没有明确地画出路的目标，也没有表示前途是否光明。我每每看着这幅画沉思。

奥列格和柳芭

刚到美国，糟糕的英语使我饱受挫折，在美国很难找到份起码的工作，四处碰壁。经过再三申请，我终于在一家麦当劳快餐店找了个时间不固定的工作。工资是 4.25 美元一小时，这是美国法定最低工资。我的工作是清扫擦洗饭厅、厕所，倒垃圾等，一个星期可干 20 至 30 小时不等。快餐店的经理戴安娜是个 20 多岁的白人姑娘，对难民、刚来的移民、外国学生相对友善，所以难民中心常介绍些难民前来打工。与我同时受雇的一对俄国犹太夫妇就是难民中心介绍来的。男的叫奥列格，瘦干、金发、八字胡。人才 40 多岁却满脸皱纹。女的叫柳芭，圆滚，红苹果一样的脸蛋让人联想到打蜡的地板。也许他们觉得戴安娜善良可欺，从进店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抱怨，并提出各种要求。柳芭的抱怨居然也获得一些成效。她由洗碗间转到了厨房。极有限的英语不影响她不断地到戴安娜那儿诉苦。经理向她解释了些什么之后，她就瞪着圆眼，“也许，也许”，不知她是否真的听懂了。进了厨房之后，她就一刻不停把各种熟肉、乳酪、鸡蛋送进嘴里，根本不顾经理再三的警告。她当然知道工作时间，特别是在厨房干活不许吃东西，可她就是经不住食物的诱惑。我担心的倒是她的肥胖，人可真架不住这么吃！

麦当劳在顾客不多的情况下，常常让工人提前下班。可工人是按劳动小时付工资的，提前下班就意味着少挣钱；当然

没有愿意被提前打发回家，不过人们基本上还是服从经理的分派。如果让柳芭回家，她便一声断喝：“我需要工作！”拒绝服从。我虽佩服柳芭的泼辣，但总感到有一天她会被哭笑不得的经理炒鱿鱼。柳芭很有优越感，常向我谈起她在莫斯科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但她糟糕的英语使我始终没有明白她在前苏联干的是个什么养尊处优的活。

半个月之后，柳芭突然不见了。这当然是她成天在厨房大吃的恶果。不过不是被炒了鱿鱼。而是得了急性胆囊炎，开刀住院了。这还不是最糟的，由于她没有医疗保险，她欠了医院好几千元的手术费。奥列格神色黯然了好几天。

我虽然同情奥列格，可又觉得他身上虚荣和尽可能的懒惰显得既可笑又讨厌。

奥列格时常说，在前苏联他是电气工程师。他深信在美国他会很快找到相应的位置。一段时间内奥列格同我一起干清洁工的工作。一天同顾客聊天时，我说奥列格和我都是清洁工。顾客离开后，他大为光火地朝我喊叫：“我是电气工程师，不是清洁工！”那愤愤然的样子，看来他并不愿意回到他的现实中来。

奥列格的俄式英语没人能懂。那些个能耐心听他讲话的老人们费劲地猜测他的表述，时而还热心地纠正他的发音。一次我看到一位老汉把舌头夹在前边上下牙之间教他发“th”的音。可奥列格无论怎样也学不会。看他们认真的脸对脸相互吐舌头，不知情的人大概认为他们正在嘲弄对方。

这位“电气工程师”是不可能认真地在快餐店工作的。工

作时间内他常以各种借口逃避干活。他拿起扫帚说是打扫停车场，结果几个钟头也不回来。经理让我去找他，发现他正坐在停车场边上的草地上打盹。叫他去地下室搬箱子，他的胳膊立刻就伸了！眼看该下班了。他忽然上厕所，一去就是近一个钟头，目的就是多拿点钱。麦当劳的工人都是用时间卡计算工时。如果奥列格该下午 2:30 下班，他在 2:15 去厕所，这上厕所的时间包括在劳动时间内。他 45 分钟后才从厕所出来，那他的劳动时间将延长半小时到 3:00 结束。我想象不出奥列格憋在厕所里一根根吸烟的快意，更诧异的是他怠工，占小便宜的本领如此“炉火纯青”。也许这个前苏联“大锅饭”的产物，天经地义地认为做人就得这么做。

我对奥列格的心情是复杂的。在麦当劳相熟后，我们很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我俩曾一起激动地唱“莫斯科——北京”。他用俄语，我用中文，一起回味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他也关心政治，支持改革。说到我俩都感兴趣的问题时，真想和他讨论一番，可惜我俩的英文都同样的糟糕。可到后来，我对他“苏联老大哥”的劲头越来越不堪忍受。奥列格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对我呼来喝去。戴安娜让我俩倒垃圾，他只负责把大的垃圾口袋从塑料垃圾桶中拿出来，指着让我拖着这装满垃圾的口袋走上好远扔进巨大的垃圾箱中。我俩开始清扫工作时，他肯定让我扫厕所。如果来了集装箱卡车给麦当劳店卸货，他会让我把各种冷冻食品原料从集装箱里卸下来，然后搬到传送带上运到地下室的冷库里。奥列格则穿着大皮袄站在冷库里，等着传送带把各种箱子送到他手边。他则很轻松

地把箱子分类摞起来就是了。他简直成了我的工头！

他说他干的是技术活！用的是脑子！他干“技术活”的依据就是他1小时挣5美元，而我只有4.25美元。麦当劳店每天要奖励一个工作最好的店员免费吃顿饭。奥列格竟然还得到了这奖励！他得意地告诉我，“你得去争！”他宣称他每小时5美元的工资也是争来的。“你不去争，就永远挣4.25美元！”

奥列格的“技术”其实就是这样少劳多获。我不能太客气了！又到我俩卸集装箱车的时候，奥列格照例穿上皮袄走到地下室的冷库里，挥挥手让我从车上卸货。我不动声色，架好传送带后，默默地把沉重的箱子从车下卸下来堆在传送带边上。奥列格呆在冷库里半天不见原料箱传下来，不断地大叫，“我准备好了！”我根本不理，直到奥列格冻了小半个钟头，实在耐不住，跑上来看个究竟的时候，我劲头十足地大喝一声，“现在开始！”迅速地把堆在传送带边上的各类箱子一个挨一个地放到传送带上。奥列格见状，话也没来得及讲便跑回去。大批各种原料箱传下去，不一会儿奥列格便大叫，“停一下！”我根本不听，还是一个劲地往传送带上放箱子。

等我再去地下室拿东西时吃了一惊，经理戴安娜正大发雷霆，抱怨奥列格把活干得如此之糟。首先是各种原料箱没有很整齐地分类摞好，乱糟糟地堆了几大摊。另外遍地都是摔破的箱子中漏出来的冷冻食品。戴安娜要他重新清楚地分类摞好这些原料箱。我不由地紧张起来，盘算着该怎样把一切责任推给奥列格。可这条可怜虫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

说，是英语太糟无从辩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奥列格上半身被汗湿透，尽管冷库温度在零下 10 度。见他满脸汗水，满眼噙着泪水，我内疚了。我们毕竟是同受异乡之苦的人。

过后的一段日子，我颇照顾了奥列格，干了不少他份内的工作。可他忘性不小，渐渐地又对我发号施令起来。我不得不还以颜色。我毫不含糊地和他斤斤计较，不让他占一点便宜，奥列格也就一声不响地干自己份内的活去了。他的这种处事哲学大大毒化了工作气氛。每天就为一点小事，互相扯皮，你少干了，我多干了，我已腻透了！看他那乐此不疲的样子，真想为他痛哭一场。人怎么落到这种地步！

柳芭又回来了。手术后的一个月，她恢复得不错。依旧肥胖的柳芭改戏了，她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地毫无顾忌地大吃，但她周围的食品消失得仍是非常迅速。她有颇大的挂包，下班时总是很鼓！里面装着各种偷偷装入的熟食。

她病刚好，戴安娜不可能给她安排什么活。这下柳芭急了，积极“请战！”她到经理那儿要求增加工时无效时，柳芭又大叫起来，“我需要工作！需要钱！”

谁都需要钱。戴安娜要想得到提升，挣更多的钱，就不可能把快餐店办成慈善机构。我从这美国姑娘的眼里看到越来越多的不耐烦。

戴安娜不再给这对夫妇安排固定的工作时间。他们不是给安排在早上 6 点开始干活，就是晚上 8 点到 12 点。奥列格和柳芭住在市中心的贫民区。他们没有自己的汽车，每天到

店里来上班要坐公共汽车。可大清早和夜里是没公共汽车的,而且公共汽车的班次很少,一般是半小时一趟。这不是明摆着让他俩干不成吗?俩口子找戴安娜诉苦,可就是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意思,或者女经理故意装着没听懂。他们又找难民中心的人帮忙。这天我看见难民中心工作的一位热心的小伙子带着奥列格、柳芭和他们懂英文的俄国朋友一起来找戴安娜。他们谈了许久,我不知道最后谈出个什么眉目。反正奥列格和柳芭的工作时间仍在大清早或晚上。这俩口子的俄国朋友们还挺够意思,开车接送他们干活。

按理说他俩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劳动态度为妙。可他们不,依然如故。尤其柳芭,偷拿食品的行为愈发严重,戴安娜终于翻脸了!女经理先是恳请奥列格和柳芭辞职。戴安娜说她不想因工作不好为由解雇他们。那样做他们到其它地方求职有可能遇到麻烦,因为工人受雇之前雇主往往调查求职人员原来的工作状况。这对犹太夫妇先是不肯,然而戴安娜每星期仅给他们安排两小时的活,逼得他们不得不辞职。

很久,我在难民中心又见到奥列格。他正在一所高中当清洁工,一周20小时,工资仍是4.25美元一小时。他显得消沉,不想和我多说什么便匆匆离去,以至我都没有时间跟他开个玩笑。

大、小阿马德

两位来自阿富汗的小伙子也是我的工友。他们都叫阿马

德,一高一矮。阿富汗过去是英国殖民地,所以他们能讲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与戴安娜交流不成问题。他们的工作是厨师。活很简单,冷冻的牛肉饼、土豆条、面包等从地下室的冻库中搬出放入厨房,该炸的炸,该烤的烤,根据供需情况迅速地制成各种热烘烘的汉堡包;关键是速度!经理手下还有几个工头,他们各司其职。厨房的工头不断吆喝汉堡包的品种和数量,厨子们便动作如飞地埋头工作,刀铲乱响。

工头都是美国人或英文讲得极好的外国学生。厨子有些是附近高中的美国学生,多是黑人;再有就是外国学生或来自英语区国家的难民。美国的中学生常常为挣点零花钱,干两三个星期就走人了。外国学生们也干不长,或是找到相对好的临时工作,或是学业太紧张,人换得像走马灯。唯打工的难民相对稳定。大、小阿马德和一个索马里来的沉默不谏的小伙子,从我进店时就在里边干。直到我离开那个店,他们仍在那里。

大、小阿马德最能干,经理常让他们每星期干 35 小时以上,但绝对不会超过 40 小时。因为他们是临时工,不能安排 40 小时(一周五天工作制)。正式工要有医疗保险、法定假日工资和休假工资,麦当劳不会不算这个帐的。另外,一周工作超过 40 小时,就要付超时工资,工钱在原工资基础上增加 50%。如果你的工资是 4.5 元 1 小时,第 41 个小时的工资就变成了 6.25 元。这对竭力降低人工成本,在剧烈的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美国快餐店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在这家麦当劳所在街道短短几百米的距离内竟有 6 家快餐店,分属 4 个

全国连锁店公司，不降低成本行吗？

大阿马德性格开朗，能说会道。他在快餐店里里外外穿梭般地干活。戴安娜见到他就眉开眼笑。但人不可能完美，我疑心他有胡乱吹牛的毛病。他说他的父亲在阿富汗是个大富翁，两个哥哥已被分别送到法国和英国读书。并拿到博士学位。他被父亲送到美国，希望日后能成为医生或律师。可他天性不爱读书，却喜欢从商；对快餐店这么热衷，是因为他希望以后也能成为一个快餐连锁店的大老板，他要多积累些经验。可他如果不是作为难民，而是作为外国学生到美国，至少应该在学校登记注册，当我问他是否持有学生(F-I)签证时，他竟茫然不知我在说什么。

戴安娜喜欢他除因他努力工作外，还有他很帅的外表。他总是穿着整洁，对所有人彬彬有礼，很热情。他有一部用了十多年的旧车，总是擦得发亮，车内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些小玩意儿光闪闪地挂在前窗下作为点缀。的确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

大阿马德又在另一家麦当劳找到了份工作。他说他在那里当工头，每小时 7.5 美元。他每周的工作时间增加到近 70 个小时，应该说相当疲劳，可你只要见他来干活，他就在那儿拼命。这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像牛犊子一样有使不完的劲。他还把小阿马德也介绍到那家麦当劳工作，从而使小阿马德也增加了收入。

我问小阿马德有关我对大阿马德的疑惑，他总是不置可否的笑笑。他永远是笑眯眯的。当我被分派到夜班洗刷厨房